

戴逸

主编

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

陈垣

学术思想评传

牛润珍 著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戴逸 主编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

陈垣学术思想评传

牛润珍 著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垣学术思想评传/牛润珍著. —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9.5

(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/戴逸主编)

ISBN 7-5013-1627-9

I. 陈… II. 牛… III. ①陈垣(1880~1971) — 学术思想 — 研究②陈垣(1880~1971) — 评传 IV. K825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6990 号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

书名 陈垣学术思想评传

Chen Yuan Xueshu Sixiang Pingzhuan

著者 牛润珍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(原书目文献出版社)
发行 (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)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首都师范大学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(毫米) 1/32

印张 11

字数 265(千字)

版次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书号 ISBN 7-5013-1627-9/K.288

定价 22.00 元



陈垣先生
(1880-1971)

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

(代序言)

戴 逸

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,应该说: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、创新的世纪、辉煌的世纪。一百年间,名家辈出,群星灿烂,成果丰硕,推陈出新。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,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,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、撞击、融合中,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生,并迅速地茁壮成长。一百年内,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,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。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的学术发展,明辨其是非得失,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,是为了推进 21 世纪的学术,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。

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,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,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。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,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但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,帝国主义侵略中国,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。西学东渐,经历了几个阶段,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,其后是制度文明、精神文明的传播,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。西方的学术文化,涵盖广阔,影响深远,进入中国后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,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。其间,中学和西学、旧学和新学、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。中国 20 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。

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,19 世纪末,他翻译了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,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,使中

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此后,他又陆续翻译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,穆勒的《群己权界论》,甄克思的《社会通论》,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,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,穆勒的《穆勒名学》,耶方斯的《名学浅说》,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、著述的领域,中国近代的经济学、政治学、法学、社会学、逻辑学得以借鉴,因之萌生。

1901年,梁启超发表《中国史叙论》,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:“自世界学术日进,故近世史家之本分,与前者史家有异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,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,与其原因结果。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,虽名为史,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,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,即国民全部之经历,及其相互之关系。”他大声疾呼,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,发生革命性的变化,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,他说:“史界革命不起,则吾国遂不可救,悠悠万事,唯此为大。”此时,夏曾佑编写《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》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。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,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《法学会杂志》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;王国维、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;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、王国维研究叔本华,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;五四时代,陈独秀、胡适鼓吹文学革命,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,胡适写作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。至于自然科学,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、徐寿、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,做了大量准备。1915年,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《科学杂志》,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。

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,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。西方的各派学说,众多著作,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,冲进中国。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、甄

别、吸收,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。学者们,作为中国人,生于斯,长于斯,在中国接受教育,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。20 世纪的第一代学者,从旧时代过来,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。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,如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吴虞等,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,竭力反对旧传统,要与旧传统决裂,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,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。真像他们自己所说: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,进行了反戈一击。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“全盘西化论”者,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。只要你是中国人,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,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,“今日之我”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“昨日之我”。

同样,20 世纪的中国学者,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、顽固,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。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、优越性日益明显,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,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。近代生活中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,西服革履、西餐大菜、洋房高楼、汽车飞机,西方文明,无处不在,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?茅盾在《子夜》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,顽固不化,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,口诵《太上感应篇》,居住的却是洋房,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。拖着辫子,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。20 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,人们都在亦中亦西、非中非西、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。

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。历史上,佛教文化传入中国,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,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,才逐渐地融合,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——禅宗,和佛学化的儒学——理学。明清之际,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,虽有徐光启、李之藻甚至顺治帝、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,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,经一、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,并未能

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,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,是一个长期、缓慢而艰难的过程。

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,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,其声势之大,影响之远,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。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,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,在上个世纪末,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,中学已阵脚大乱,败下阵来。必须吸取西学之长,“以洋为师”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,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。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,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,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,脱颖而出,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。

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,大体上说,有以下特点:

一、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。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,颂先圣而薄后王,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,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,故而欺凌争斗,社会日益退步。19 世纪末,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,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,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,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,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。这样,20 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,树立起近代新观念。五四运动前后,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,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,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,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,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,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。20 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。20 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。而在 1949 年后,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,在它的哺育下,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。

二、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。中国传统学术,分成经、史、子、集,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,其中经学特别重要,凌驾于上,且涵盖一切。《易经》中包括数学、哲学、自然科学;《书经》中包括政治学、历史学、地理学;《诗经》中包括文学、艺术、

自然科学;《礼记》中包括政治学、伦理学、教育学;《春秋》中包括历史学、政治学。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,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,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。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、规模齐备,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。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,独立为一大学科。其中分门别类,学支林立,建立了数、理、化、生、农、工、医等大学科,门类繁多、内容充实,洋洋大观,达到了较高水平,且有裨于国计民生。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,文史哲分离,形成各自的专业,经济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社会学、新闻学、政治学、心理学等新学科,纷纷诞生独立。由于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,人们对自然、社会、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,知识量、信息量巨大增长,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,范围日益扩展,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的旧框架,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。

三、理性方法的运用。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、逻辑不够严谨,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。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,冥心静思,自省修养等等。某些非理性的方法,如形象的、感悟的、信仰的、揣测的、情绪的方法,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、或虚幻的状态,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,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,天人感应说,明心见性说。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,运用归纳和演绎,重视证据,“无征不信”、“孤证不立”,摒弃主观成见,抱着冷静、客观的态度,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、准确的认知活动。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、望远镜、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,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,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。20 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,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。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、信仰或权威。

四、高扬爱国主义精神。中国进入 20 世纪,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,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,内忧外患,民

不聊生。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,人民苦难,抱着无限的同情,唤起自己的责任感,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,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,矢志钻研,目的就是为了救国。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。反对帝国主义侵略、反对封建主义压迫,使国家富强,人民幸福是 20 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。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,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,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,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,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,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,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。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,它推动国家的前进、呼唤民族的奋起、激励大众的斗争,因此,爱国主义渗透其中,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。20 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。

此文原为《二十世纪中华学案》序言,现作本书代序,并加标题。

目 录

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(代序言)	戴 逸
第一章 家世与略历	(1)
一 新会与陈氏家族	(1)
二 青少年时期:科举——学医——办报——从政	(5)
三 1917 至 1948 年:治学、教学及其他	(17)
四 建国后二十三年:焕发青春与晚年阴郁、苦闷	(90)
第二章 主要著作与学术成就	(120)
一 援庵的著述与出版情况	(120)
二 宗教史研究的主要著作与成就	(121)
三 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	(168)
四 援庵的元史研究	(198)
五 《通鉴胡注表微》与援庵史学的总结	(209)
第三章 学术思想及渊源、发展	(216)
一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思想精髓	(216)
二 通史以经世致用的思想	(219)
三 爱国主义的思想	(225)
四 “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”	(233)
五 钱、顾、全、毛——援庵学术思想发展的主线	(236)
第四章 治学道路、方法与学风	(241)
一 从考据学、爱国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	(241)
二 深具科学性的治学方法	(247)

DK38/27

三	匡救时弊的严谨学风·····	(260)
第五章	陈援庵的社会交游·····	(267)
一	交游的一般情况·····	(267)
二	交游的主要人物·····	(270)
第六章	学术地位与影响·····	(296)
一	学术地位——20 世纪传统史学的陈援庵时代 ···	(296)
二	“动世界而垂久远”的学术影响·····	(302)
附录：	·····	(323)
一	陈垣主要著述年表·····	(323)
二	陈垣遗著整理目录·····	(334)
三	陈垣生平学术研究论著目录·····	(334)
后 记	·····	(339)

第一章 家世与略历

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、教育家陈垣，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载誉海内外，被学术界称为“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”。^① 他在宗教史、中国历史文献学、元史等方面的贡献于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，形成一大流派，并开创了独具风格的史书著述体例——“援庵体”，开一代风气之先。他接过清代乾嘉考据学，又为传统史学劈造了一个新时代，可谓是 20 世纪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顶尖人物之一。

陈垣，字援庵，幼年曾名星藩，青年时撰文署名钱、钱璽、谦益、谦、艳、蔚、宗、益等，定居北京后一度用名援国，还曾字圆庵，别号圆庵居士。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（1880 年 11 月 12 日）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（今广东新会市棠下乡石头村富冈里），1971 年 6 月 21 日逝世于北京，享年九十一。九十一岁的生涯，有 33 年生活在家乡新会和广州，其余时间都居住在北京。

一 新会与陈氏家族

援庵的家乡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，东北距省会广州 110 公里，东、西、南、北分别与顺德、江门、开平、中山、南海等县市相

^① 牟润孙：《励耘书屋问学回忆》，载于《励耘书屋问学记》，三联书店 1982 年 6 月版。

接。“山海交错，在古为剧郡”^①。虽算不上名邑，但亦有地方特点。明万历年间黄淳辑《新会县志》并撰《序》云：“新会之所重于天下者，以有江门道学，厓山忠节在然。”道光《新会县志·黄培芳序》亦云：“至厓山忠节关乎一代存亡，白沙理学系乎千秋道脉，尤属别邑所无。”厓山在新会县城南。南宋祥兴二年（1279），丞相陆秀夫兵败于此，宁死不降元兵，负帝昺沉海殉难。明清故老世传陆秀夫墓在境内二城村，称二城为忠臣山。江门道学、白沙理学均指明代著名理学家陈献章。陈献章是白沙（今新会市白沙乡）人，明成化十八年（1482）由举人征学行授翰林院检讨，白沙也位于新会县城东北，距石头村仅 10 多里之遥，厓山忠节与白沙理学均对陈垣有所影响。1948 年 4 月 25 日，陈垣等游颐和园，于昆明湖畔存照，并在照片上亲笔题曰：“身立厓岸，而心不立厓岸也。”以昭示其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。他还注意搜集陈献章遗墨珍藏励耘书库。史树青曾回忆说：“（陈垣）先生收藏书画及清代学者手稿甚多，曾在辅仁大学公开展览，印有目录。书画中远如明人陈白沙（献章），近如清末陈兰甫（澧），皆岭南名家。记得陈白沙手书《心贺》卷，后有沈尹默先生题词，调寄《减字木兰花》，词云：‘崖山风月，千古精诚相对接。省视堂堂，一卷昭然日月光。狂心飞鹤，动静随时都是学。活活乾乾，此趣于今腕下传。’先生与陈白沙皆新会人，崖山在新会南八十里海中，故尹默先生词中及之。”^②除陈白沙外，还有清代著名学者胡金竹。胡金竹名方，字大灵，号信天翁，新会金竹冈人，学者称金竹先生。陈东塾序金竹《鸿桷堂集》，有曰：“粤之先儒，自白沙先生后，越百余年而有金竹先生，粤人皆以金竹比白沙。”陈援庵云：“余少时趁棠下墟，必经金竹冈村口，村口有丰碑，

① （清）道光《新会县志》言良钰《后序》。

② 史树青：《励耘书屋问学札记》，载《励耘书屋问学记》，三联书店 1982 年 6 月版。

高寻丈，刻曰‘金竹先生故里’，故余对金竹之名甚熟，而未尝注意其生卒年。”^① 1963年12月他撰《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》，考证金竹生于顺治十一年，卒于雍正五年。
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新会因出了梁启超等一批人杰，乡里愈发有了灵气，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籍贯南海，新会与南海地理相接，在19世纪，这里同时升起了两颗变法新星，赫赫康梁，光耀乡里，新会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。19世纪80年代初，又诞生了一代史学宗师陈垣，“新会援庵”便如雷灌耳，使一代又一代学人发聩，人杰地灵的新会，便成了学术界人人尽晓的地方。

新会士风自古端正。“士人尊师务学问，不逐虚名，仕者以恬退为乐，竞进为耻，尚门第，矜气节，慷慨好义，无所谄屈”^②。故乡的士风亦当深深影响了陈垣，这为他以后立身处世、治学著述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。1922年5月，他从教育次长的位置退下来，转而一门心思教学、著书立说，并于北京沦陷期间抗节不仕，借撰述表达爱国精神、民族气节，这不能不说与其自幼所受故里士风的熏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陈氏在新会可算是大姓，这一族姓居民主要分布在邑城、外海、白沙、京背、石头等城镇乡村，其族源缘起如何，至今还难能找到系统材料加以证明，但从明清以来的《新会县志》所反映的情况看，均以南朝陈至德四年（586）封陈叔坦为新会王为最早。《陈书》卷28《陈叔坦传》曰：“新会王叔坦字子开，高宗第三十一子也。至德四年，立为新会王。”但不久，陈亡，入隋，于大业年间为涉（今河北省涉县）令。陈叔坦是否就封新会？其后裔可曾留居这里？也没有材料能够说明，从地方志书的有关记载看，起码在宋元时，陈

① 见《陈垣学术论文集》第二集，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，第78—79页。

② （清）道光《新会县志》卷2《舆地·风俗》。

氏族姓就已经在新会定居、劳动生产并繁衍生息了。到了明清,陈氏发展成大户居民。陈姓家族曾出了不少进士、举人,特别是白沙陈献章,足以使新会陈氏族姓的人引以自豪,竞相夸耀而奉为楷模。至于陈氏族系亲缘传承如何?诸陈氏与陈垣这一支系有何关系?这恐怕已难能搞清楚了。据道光《新会县志》卷6《选举表》,记载有“陈兆桂,石头乡人,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科(举人),广西归顺州知州”。兆桂亦石头乡陈姓,当为援庵祖上,或是比较亲近的旁系远祖,约在同治、光绪时,陈家又出了一位进士翰林陈简墀,即援庵的叔父(见启功《夫子循循然善诱人》,载于《励耘书屋问学记》,三联书店1982年6月版),援庵后来虽曾提到他这位叔父,但不曾言及对其学问上有什么影响,由此看来,陈简墀曾使援庵感到光彩,但没有家学关系。援庵于学术虽“没有师承,也没有家承”^①,但崇尚诗书的家族传统无疑给了他深深的影响。因此,他早年也曾梦想走科举致仕的道路。

尽管陈姓家族出了许多文人仕宦,但在陈垣的直系宗族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什么显赫人物,其高祖陈茂台、曾祖陈良英,都是平民劳动者。祖父陈海学,堂号宁远堂,于19世纪50年代,离家到广州,创办陈信义药材店,店址在广州老城晏公街闽漳会馆旧址。

海学九子,三子维举,五子维启。维启即陈田,别字励耘,有两子四女,长子即陈垣,次子陈国键。清光绪十一年(1885),陈垣的三伯父陈维举病逝,无子,由垣入继。

海学老人过世后,维启承继父业,到广州经营药店,成为一名药材商人,仍家居广州外城晏公街。陈垣《跋何其厚重修晏公神庙碑记》曰:“余居广州外城之晏公街数世矣。”^②晏公街陈信义药材店是家老字号店铺,抗战爆发后,援庵的三叔、彦叔仍主持店铺,并

① 陈乐素:《陈垣》,载于《中国史学家评传》下册。

② 见《陈垣学术论文集》第二集第403页,中华书局,1982年2月版。

在湛江、香港开设有分号，其胞弟陈国键曾一直在香港主持分号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，陈信义药材店的生意一直是很好的。陈家世代经营的药材生意对于援庵也是有影响的，不仅保障了他的生活，还为其读书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。

二 青少年时期： 科举——学医——办报——从政

幼年的陈垣是在母亲的怀抱中长大的，母亲虽识字不多，但知礼仪，勤劳淳朴，善持家，教陈垣伊呀学语，也常常教些流行的儿歌。陈垣聪颖好学，一学便会。在他5岁那年，即清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，父亲便把他从新会老家接到广州，使之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。次年，陈垣入私塾读书。“这座私塾设在成兴杂货店后院，是几间宽大的北房”，教他的老师名叫冯掖薇，是一位老秀才。“以后曾转学到几个学馆念书，学馆有彭老师，杜老师等，这几位老师对他影响都不大”^①。学馆使用的启蒙教材仍是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，稍大些的学生便读四书五经，学习方法只是呆板地死背，不能背就挨打，年幼的陈垣似乎对这一套教学方法还未适应，尝“用逃学一法来躲避”^②。大概是由于学馆的教法不得力，私塾先生除了教学生背书外，别无高招，亦不教学生如何读书，所以未能引起援庵对课业的兴趣，于是不得不经常转换学馆。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，援庵12岁，转至闽漳会馆里院的一座学馆读书。有一天，他到老师那里问学，并浏览老师的藏书，在书架上，第一次发现了张之洞的《輶轩语》，特别是书后附刻的《书目答问》，深深地吸

① 刘乃和：《陈垣》，载于《中国现代教育家传》第1卷。

② 陈垣：《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》，载于《陈垣史学论著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。